

王应麟学术讨论集

(2011)

傅璇琮
施孝峰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应麟 学术 讨论集

(2011)

傅璇琮 主编
施孝峰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应麟学术讨论集. 2011/傅璇琮,施孝峰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302-28499-4

I. ①王… II. ①傅… ②施… III. ①王应麟(1223~1296)—人物研究—
文集 ②王应麟(1223~1296)—学术思想—研究—文集 IV. ①B244.9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4984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曲小华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张雪娇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课 件 下 载: <http://www.tup.com.cn>, 010-62795954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2mm×228mm 印 张:14.75 字 数:188 千字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定 价:45.00 元

产品编号:046276-01

序 言

沈剑波

鄞州，这块有着六千年文明、两千年县治的土地，以其名士云集、学者荟萃、文风蔚然的历史彰显着煜煜生辉、经久不衰的地域文明。自宋朝以后，鄞州士族相望，名人辈出，浙东文化日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代表性的思想成就之一，其博纳兼容、主体自觉、开拓创新、经世致用的内核，体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及厚重的学术底蕴，千百年来泽被四方，影响深远，树立起鄞州大地宏伟的文化座标。一代儒宗王应麟，既汲古深思，博学多闻，又擅属词令、富有文采，引领儒流于宋朝，启迪智慧于现代，是罕见的集学术成就与文学成就于一身的学者，是故乡鄞州的骄傲和财富。

自2008年5月，鄞州区与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共建“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以来，已举办三届王应麟学术研讨会。本届研讨会，专家们一一发表真知灼见，对王应麟在经学、史学、考据学、辑佚学、目录学、地理学、蒙学及著作版本等领域研究的成就进行了研讨，并把研讨目光延伸至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全祖望、万斯同、沈光文等身上。专家们运用丰富深厚的理论学养，不断发掘浙东学人的学术思想，使其在学术界获得进一步重视和认同。我们将之辑录成书，希望为浙东地区学术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为鄞州认识先贤、整理文脉指示方向。

目前，王应麟著作整理正有条不紊地举行，中国古典文献界元老、一代甬籍学问大家傅璇琮傅先生凭借他的学术声望和广泛人脉，

广聚国内学人之力,主持编纂大局,专家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已整理出版《汉制考》、《汉艺文志考证》、《四明文献集》、《诗考诗地理考》等作品,《四明文献集》荣获2010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著作整理取得阶段性成果,三字经及王应麟文化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深化!

人类文化的传递,总是不断地从历史走向文化,又以文化激励当代。王应麟等浙东文化巨匠产生于鄞州特定的文化和地理条件之下,凝聚了鄞州人民长期实践的成果;其学术思想一经形成,又对一代代宁波人的思想和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等文化部门挖掘历史,注重当下,着眼未来,将继续把浙东学术文化视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积极关注鄞州籍的浙东学派人物,把古籍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在发扬光大三字经及王应麟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的道路上,承担起一个先行者的角色!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序	沈剑波	I
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	王水照	1
“千品”解及其他		
——王应麟《小学紺珠·职官类》札记	龚延明	15
《玉海·地理》宋代地理史料的价值	傅林祥	24
《三字经》：一篇劝学文献	徐 梓	35
王应麟年谱考辨——《王应麟年谱·前言》	张三夕 杨 毅	43
王应麟与辑佚起源问题	曹书杰	60
王应麟与《周易》研究	郑振峰	67
被忽视的宋末文学大家王应麟	张骁飞	81
《玉海》点校凡例及点校稿	武秀成 赵庶洋	106
《困学纪闻》整理点校说明	孙通海	123
王应麟经学天文学思想评价之商榷	张如安	127
王应麟作品与形象传播述论	钱茂伟	134
新发现的王应麟佚文《小学箴》	张如安	157
试论浙东学术与浙东藏书	顾志兴	159
斯世虽乱，吾心不乱		
——略论张寿镛先生编纂《四明丛书》	俞信芳	176
南明孤臣，海东初祖——开台先师沈光文	戴松岳	199
开台先师沈光文	王重光	219

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

王水照

—

号称“通儒”的王应麟一生怀有“词科”情结，影响到他的行为选择和著述取向。他的父亲王撙，虽中进士却未能考取博学宏词科，终身抱憾，“他日必令二子业有成”^①，他课子严苛，期待迫切，临终时犹以此事殷殷嘱咐应麟、应凤这对孪生儿子^②。王应麟于淳熙元年（1241）举进士，时年 19 岁，取得了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的资格，就积极备考，广泛搜集资料，随时整理归类，“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③，“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典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④，孜孜矻矻，毫不懈怠，终于在宝祐四年（1256）中科，践尝了这一夙愿，时年 34 岁，离中进士已足足 15 年。他的弟弟应凤也于开庆元年（1259）考取，成为现有资料最后一位博

① 见《延祐四明志》卷五《王先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王应麟《浚仪遗民自志》云：“先君擢第之岁，与弟太常博士应凤生同日，嘉定癸未也。”其子王昌世《宋吏部尚书王公圻记》亦云：“先公（应麟）于嘉定十六年七月庚午与叔父太常博士讳应凤生同日”，均明确说是孪生兄弟。（见《四明文献集》附录，第 570、572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但钱大昕《深宁先生年谱》谓两人虽生于同日，但相差八岁，所据不详。（同上书，第 530 页）王应麟之弟子袁桷《挽伯厚先生诗》首云“秋水孕双莲，英英吐异芬”（同上书，第 629 页），亦以“双莲”隐喻孪生。

③ 见《宋史》卷 438 王应麟本传，第 12988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④ 陈仅、张恕编：《王深宁先生年谱》引《至正直记》，见《四明文献集》附录，第 545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学宏词科中式者,兄弟相踵,一时传为佳话。

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促使他编撰了一系列有关词科的书籍,既为自我积累之用,又应社会广大举子要求。《辞学指南》就是迄今唯一一部词科研究专书,附见于他的《玉海》之末^①。《玉海》共200卷,是一部体大思精、搜讨宏富而又自具特色的类书。取名“玉海”,意指“若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突出其内容之珍贵和蒐罗之广博,又云:“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标举“德”、“善”等传统信条。它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21门,门下又细分若干二级小类,纲举目张,条理井然,不单是文献资料的排比辑录,也反映编者对世界万事万物的一种条理化的整体观念,努力使之成为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知识体系。比之一般的唐宋类书,此书有两点尤当注意:一是为“词科”应试服务。《四库全书总目》卷135即指出:“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词科”考试制、诰等文体,大都为朝廷代笔,内容自然偏重于“巨典鸿章”、“吉祥善事”,在类书编纂取材时就对此有所突出和强调,以更切合实用。二是重视宋朝史料。《四库全书总目》又指出:“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这是因为词科考试的内容,“古今杂出”、“每场一古一今”,古今史事并举,故在取材时又需注意本朝史料的摘取编辑。“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是肯定其作为宋代史料的独特价值;阮元《学海堂集序》中说:“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②也推崇王应麟对于“史志”处理的“家法”。至于“唐宋诸大类书未有

① 本文所引《辞学指南》一书,均据王水照所编《历代文话》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为避繁赘,不再一一出注。

② (清)阮元:《经室集·续集》卷四,第10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能过之者”，则是对其总体的评价了。

除《辞学指南》、《玉海》外，王应麟词科著作还有《词学题苑》40卷。至于他的名著《困学纪闻》，博赡精深，涉及词科者亦随处可见，其卷十九为“评文”，更富直接论述词科之材料。

同属浙东学派的章学诚，在论及王氏《玉海》时，曾指出“皆为制科对策，如峙糗粮，初亦未为著作。惟用功勤而征材富，亦遂自为一书”^①，也注意到此书对于科举的实用性质，并因“用功勤而征材富”而自为一书。但章氏坚持“纂辑”与“著述”的区别，并引发出对王氏此类书籍负面作用的指责。他说：“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②章氏此论，渊源有自。他在同书《浙东学术》篇中，已指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的特点，“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各因其习而习也”；但又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③，在他的心目中，“史纂”、“史考”、“史学”是犁然有别的，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章氏对“宗仰王氏”的后学辈的批评。他对王应麟的《玉海》等书，还是怀抱敬意的，在同书《答客问下》中，论及“比次之书”时，认为有三种情况：“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还有一类即是如《玉海》之属，乃是“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聚薪樵者”（《诗经·大雅·棫朴》“薪之樵之”，樵，积也），正确地指明《玉海》等纂辑排比资料之书，乃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两者既有层次的差异又有循级前行、不断探索的密切关系。章学诚对王应麟的学术评价，是有深度而全面的。

① （清）章学诚：《与林秀才书》，见刘承幹刻《章氏遗书》卷九。

②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博约中》，第1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③ 同上书，第524页。

王应麟“词科”情结之所以强烈,一是来自父命,此点毋庸赘述;二是出于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定,词科出身对政界、学界的自我形象塑造,关系重大;三是个人学术宗旨与文学志趣使然。南宋士人中虽不乏贬斥词科和词科出身者,然而在大部分士人中却颇获青睐。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云:“汤举者,处州缙云人,……遗泽遂沾其子,即进之思退也。后中词科,赐出身,尽历华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时。”^①汤思退(字进之)历仕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直至拜相,依附秦桧,丧权误国,但这条记载却反映出词科出身与他仕途顺遂的微妙关系。周密《齐东野语》记真德秀云“时倪文节(倪思)喜奖借后进,且知其(真德秀)才,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真德秀固然出类拔萃,倪思“与之延誉于朝,而继中词科,遂为世儒宗焉”^②。这则材料则透露了词科与“儒宗”直接的隐性联系。无独有偶,王应麟登进士第后,自言:“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③他发誓不能止步于进士科,为考中博学宏词科而“闭门发愤”,在他看来,博学宏词科是达致“通儒”的必由之路。《四库全书总目》卷165在评其《四明文献集》时也说“应麟以词科起家,其《玉海》、《词学指南》诸书,剩馥残膏,尚多所沾溉;故所自作,无不典雅温丽,有承平馆阁之遗”,颇为中肯地指明词科对王氏文学创作趋尚的具体影响。

二

要深入而具体地了解王应麟的学术宗旨与文学志趣,我们可通过对其《辞学指南》的研究,把握他的一个侧面。

①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第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②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第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 见《宋史》卷438王应麟本传,第129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辞学指南》四卷,附刻于《玉海》之后,如果说《玉海》为应试词科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辞学指南》就是有关词科肄习方法、考试试格,以及制度沿革的专门著作,两者互为表里,交相为用。不少词科出身者均热衷于编辑类书,如唐仲友即编有《帝王经世图谱》十卷,周必大谓其“凡天文地志、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伯,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午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①,说明此类类书的编辑,其出发点是为自己迎考所作的肄习工夫,初不在为他人提供参酌,也就是说,首先是为己,其次才是为人。正因为有《玉海》作准备,王应麟的《辞学指南》才显得论述扎实,语无虚饰,超出于泛滥成灾的科举图书之外,而成为富有学术内涵的专著,在我国科举学史上有其价值与地位。^②

《辞学指南》前有《自序》,言简意赅地论述两个问题:一是宋代词科设置、沿革大略,大致有三个阶段:(一)绍圣元年,“五月,中书言唐有辞藻宏丽、文章秀异之科,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于是始立宏辞科。二年正月,礼部立试格十条”。原来在进士科罢诗赋后,“纯用经术”,公文写作人才一度匮乏,朝廷文告的撰述成为“众之所难”,为了补缺纠偏,才决定设置“宏词科”^③。(二)大观四年,“改为辞学兼茂科”。(三)绍兴三年,“七月诏以博学宏词为名”。随着这三次改名,考试的科目均有相应的变动。在宋人的用语中,把“宏辞科”、“辞学兼茂科”、“博学宏辞科”都统称为“词科”。但宋末嘉熙二年,另立“词学科”,考试难度降低,不久废置,“今唯存博宏一科”。前人一般对此短期存在的“词学科”忽略不计。王氏概括这三次改名的情况

① (宋)周必大:《帝王经世图谱题辞》,《文忠集》卷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当今尚无有关宋代词科的研究专著。聂崇岐《宋词科考》(载《宋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祝尚书《宋代词科制度考论》(载《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是两篇最见功力的论文。

③ 洪迈《容斋三笔》卷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四均谓始立宏词科在绍圣二年,王应麟等认为在绍圣元年,是。次年正月,“礼部立试格十条”,已进入具体运作阶段;“始立宏辞科”,应在此前之绍圣元年。参见聂崇岐前揭文之考证。

云：“绍圣颺取华藻，大观倣尚淹该，爰暨中兴（即绍兴三年以后），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矣”，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先重华藻、“宏词”，继尚淹该、“博学”，最后达至“博学宏词”并重而又以“博学”为先之境，正与其科名相吻合。

二是提出衡文的标准。王应麟写道：“朱文公谓是科习谄谀夸大之辞，竞骈俪刻雕之巧，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然则学者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云。”作为词科人，王应麟既怀自豪之感，又不讳言科举中的不良文风，他治学兼取朱、陆，自然尊重朱熹的批评意见，并把“深厚简严”树为文章圭臬，纠正谄谀夸饰雕琢之时病，也是他编著本书的现实针对性之所在。

《辞学指南》正文四卷，第一卷讲叙肄习之法和作文门径，第二、三、四卷分论词科所试各个科目即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最后附以《辞学题名》。内容重在指导学子的学习和写作，不专力于词科制度，但自具逻辑系统，编次井然有序。

在第一卷中，分编题、作文法、语忌、诵书、合诵、编文六个子题，王氏大量引用前人和时辈的名言隽语，而参以己意，使之相互阐释学习与写作之道，注意理论性解说与作品实例的结合，同时立“语忌”专节，注意正反两方面写作经验的对照，又设置“诵书”、“合诵”专节，使“读”与“写”能够统一起来。此卷以“编题”开篇，即是指导学子应在“编阅搜寻”、“俟诸书悉已抄遍”的基础上，编制文类门目，如天文、律历、浑仪等，他共列举了137门，这里有他自己编纂《玉海》的实践体会在内。他还引用“陆贽《备举文言》三十卷，摘经史为偶对类事共四百五十二门。李商隐《金钥》二卷，以帝室、职官、岁时、州府四部分门编类”，又引传为韩愈所作《西掖雅言》五卷，晏殊《类要》“总七十四篇，皆公所手抄”等经典范例，导示学子，用心良苦。他在《自序》中主张“学者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把《六经》视为治学根本，自当涵泳精读，但在“诵书”、“合诵”等处，又主张广泛阅读，如“子书则《孟》、《荀》、《扬》、《管》、《淮南》、《孔丛》、《家语》、《庄》、《列》、《文》、

《墨》、《韩非》、《华》、《亢仓》、《文中》、《鬻》、《刘》诸子，《汲冢周书》、《吕氏春秋》、贾谊《新书》、《说苑》、《新序》，兵书则《六韬》、《司马法》、《孙吴》、《尉繚》、李靖《问对》，皆有题目，须涉猎抄节”，他还开列其他不少书目，视野开阔，博及群书。其中尤须注意的是《宏词总类》一书，此书为陆时雍所编，也是宋代有关词科的专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曾予著录，但现已佚失。《辞学指南》却详细指示阅读、利用此书的方法和步骤，从其引用来看，此书主要是辑录宋代词科考取者的程文，在今天又有科举史料的价值。

作为科举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辞学指南》在史料准确性上更具优长。王应麟是位严谨的文史学者，他的不少记述甚至比其他史书更可靠。《辞学题名》就充分体现出这个特点。《辞学题名》依次登录绍兴二年“宏辞”首科至大观三年末科取录共 31 人，政和元年“词学兼茂”首科至建炎二年末科取录共 36 人，绍兴五年“博学宏词”首科至开庆元年末科取录共 40 人，共计 107 人，这是宋代考取词科的全部名单（仅政和二年缺曹辅一人），基本完备。例如嘉定元年录取的“博学宏词”陈贵谊，《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至一二之二五，就失载了，以致影响今日有关著作也随之失载；祝尚书先生《宋代词科制度考论》曾勾稽史料，力图在嘉定以后“补史之阙”，共得六人，其中洪咨夔、李刘、郑思肖、杨攀龙四人仅为“欲应词科”或“试博学宏词”，实未最终中式，另两人即王应麟、王应凤兄弟，已见王应麟《辞学题名》的最后两名。至于聂崇岐先生《宋词科考》所补理宗嘉熙二年“词学科”林存、卢壮父两人，他已指出，此“词学科”与“宏词”、“词学兼茂”、“博学宏辞”三科不同，乃是“降等立科，止试文辞，不责记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七），“以所试较易，颇为学士大夫所轻”，且前后不过七年，开科仅五次，因而王应麟《辞学题名》不予收录，也是可以理解的。要之，名单基本完备，此其一。

这里附带讨论徐凤是否曾中词科的问题。王应麟《辞学题名》中未见徐凤，但据叶绍翁记载，他似亦中式。《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

条云：“徐(凤)、真(德秀)共习此科(博学宏辞科)，且同砚席，文忠已中异等，为玉堂寓直，徐三试有司始中……徐后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监，迟速皆命也。”^①“徐三试有司始中”，此文前已叙述徐凤曾两次应试被黜，似乎此次(即嘉定七年，1214年，详下)侥幸录取。此则记载，与王应麟有关记述不合。《辞学指南》卷四云：“徐子仪(即徐凤)《甘石巫咸三家星图序》引《周礼·箬人》巫咸事，按本处注，巫字当为箬，非殷之所谓巫咸。贡院言：‘是旁证，即非本处有差，未敢取放。’开院日，知举请与升擢。(原注：是年试者二十四人)”“知举请与升擢”，结果是否中式，没有明确交代。《辞学指南》曾列历朝试“序”题目，此三家(甘公、石申夫、巫咸)星图序之试题，列于嘉定甲戌(七年)；再检《辞学题名》，此年无人录取，二十四人全部落榜。说明王应麟对徐凤考词科情况十分了解，不可能发生遗漏之失。他在《困学纪闻》卷二十“杂识”中也记叙此事：“徐子仪嘉定中试宏辞《甘石巫咸三家星图序》引《周礼·箬人》‘巫咸’，本注‘巫’当为‘箬’，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荐于朝。不数年，入馆掌制。”^②徐凤过了数年才“入馆掌制”，是在应试落榜而被人“荐于朝”以后的事情，他未被正式录取博学宏辞科应是确定的。真德秀为他所作的墓志铭《秘书少监直学士院徐公墓志铭》对这位“同习”词科的友人更有颇详记录：“始公(徐凤)试博学宏辞，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试，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论杂然称拙。知贡举曾公从龙帅其僚荐于朝，谓公词精记博，非作者不能及，……宜被褒擢，或籍记中书，备异时翰墨之选。明年，除吏部架阁。”^③绝口未提考取词科之事。王氏《辞学题名》不收徐凤，是符合实情的。

①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第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下册，第209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③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4册，第1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其次是《辞学题名》记录的姓名准确。如崇宁元年之“石忞”，《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作“石忞”，查《直斋书录解题》、民国《芜湖县志》等，均作“忞”。政和四年的“滕庾”，《宋会要辑稿》误作“滕庚”。绍兴八年的“詹叔羲”，《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〇均误作“詹叔羲”。绍兴十八年之“季南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误作“李南寿”。乾道五年的“姜凯”，《宋会要辑稿》误作“姜凯”等。王应麟在记录被录取者时，特别留心他们的家族背景，在这 107 人中，父子三人相继中式者有三陈：陈宗召、陈贵谦、陈贵谊；兄弟三人相踵者有三洪：洪遵、洪造（后改名适）、洪迈；兄弟二人荣登者更多，计六组：二吴（吴玆、吴开）、二滕（滕康、滕庾）、二李（李正民、李长民）、二袁（袁植、袁正功）、二莫（莫冲、莫济）以及王应麟、应凤二王兄弟自己。这一现象说明词科考试比起其他科目来，需要更广博的知识储备与更严格的文词训练，引导士子家庭作出针对性的应试反应，形成家学中某种专科化倾向，这是饶有兴趣的话题。

三

《辞学指南》是现存唯一一部研究宋代词科的专书，在中国科举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在本书卷二至卷四论述词科试格等部分，更在文体形态研究、骈文批评思想和文话著作类型特点等方面，为中国古代文章学史增添重要的篇章。这就是此书在学术史上的双重意义。

本书卷二至卷四论述词科试格，即考试科目，共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类，此实为本书重点所在，因而《辞学指南》也可视为文体学著作。据王应麟《自序》，绍圣元年始立“宏词科”，次年礼部立试格十条，分为章表、赋、颂、箴、铭、诫谕、露布、檄书、序、记；后诏诰赦敕不试，“再立试格九条，曰章表、露布、檄书（以

上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大观四年改为“辞学兼茂科”时,除去檄书,增入制、诏。绍兴三年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定为十二条,即《辞学指南》所据以论列者。还规定“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三岁一试,如旧制”。所谓“古今体”乃指内容,“古”指“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今”指“以本朝故事或时事为题”,“盖质之古以覩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测试考生学问是否淹博,文辞是否佳妙,考评其“学”和“辞”两方面的能力与水平。从“宏词科”一改为“辞学兼茂”再改为“博学宏辞”,表示两者重心的进一步转移:“博学”优于“宏辞”。

刘勰《文心雕龙》为文体学的建立提出过明确的原则与完整的框架。在《序志》篇中,对《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分论各体文章时的写作思路,作过精到的概括:“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即探源溯流,解释文体名称和性质,评选代表作家作品,最后归纳该文体的体制特点与规格要求。这四项成为后世文体学著作大都遵循的准则。王应麟也不例外。如论“制”,首叙“制”之源流:“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为制,汉因之”;继叙“制”的功用:“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又叙“制”之作法,如论制头破题四句:“能包尽题意为佳(如题目有检校少保,又有仪同三司,又换节,又带军职,又作帅,四句中能包括尽此数件是也)。若铺排不尽,则当择题中体面重者说,其余轻者于散语中说,亦无害(轻者如军职三司是也)。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交待细致。因“制”常须提到地名、郡名、节镇名等,他又制表详列,注出其别称。与一般文体学著作不同之处,在于格外关注其与词科的关系。故所举范文,均为词科人之作(如孙觌、洪遵、莫冲等),还列举自政和至咸淳历次考试“制”之题目,供学子参酌。在具体分析时也注意及此,如引真德秀语云:“辞科之文谓之古则不可,要之与时文亦复不同。盖十二体各有规式,曰制、曰诰,是王言也,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他还拈出制词写作的三要害:“制词三处最要用工:一曰破题,要包尽题

目而不粗露(首四句体贴)。二曰叙新除处,欲其精当而忌语太繁。三曰戒辞,‘於戏’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三处乃一篇眼目灯窗,平日用工先理会此等三处,场屋亦然。”所言切实中肯,便于初学。在选择可供学习追摹的前辈文人时,也着眼于此:“前辈制词惟王初寮、汪龙溪、周益公最为可法,盖其体格与场屋之文相近故也。其他如王荆公、岐公、元章简、翟忠惠、蔡北海之文亦须编。《玉堂集》自建炎至淳熙制词具备,亦用详看。盖凡用事造语皆当祖述故也。”提示门径,颇具操作性。此书论及“制”体共占25页,比之后世文体学著作如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来,显得内容丰赡,论述详明,后来者未必居上。论及其他十一体也大致达此规模水平,故在文体学史上应居一席之地。

词科所试各体,主要是骈体文,因而《辞学指南》又可视作骈文论或四六话的一种。我曾把我国古代文话划分为四种类型:颇见系统性与原创性之理论专著(如陈骙《文则》);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著作,即狭义的“文话”;辑而不述的资料汇编式著作及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①。在王应麟之前,有王铨《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洪迈《容斋四六丛谈》及杨园道《云庄四六余话》等四种骈文话,前三种属于第二类(洪迈之书乃后人从《容斋随笔》中摘编而成),后一种属第三类。《辞学指南》中虽然大量引用各家论述(尤以吕祖谦、真德秀、周必大为多),但其书自有体系和编纂宗旨,作者独立论述的比重亦大,实已从第三类过渡到第一类,即从单纯的资料汇编优入著作之林了。

作为骈文话,此书关于骈文与古文关系的论述,颇堪重视。王氏首先看重骈文的自身特点,在论“表”时说:“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语不可尖新,铺叙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纲也。”这其实也是对骈文的一般要求。在论“赞”时说:“诵咏吟哦,便句中有

① 参看《历代文话序》,《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